

# 外国直接投资的“工资溢出”效应研究

邱立成 王自峰

**摘要:** 从相对要素禀赋的角度,来系统解析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存在着显著“工资溢出”效应,此效应在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明显,但外国直接投资不是推动劳动力工资提高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在发展教育、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和吸引外资等方面的政策对于大幅提升各地区的工资收入水平具有重大影响。

**关键词:** 外国直接投资 名义工资 工资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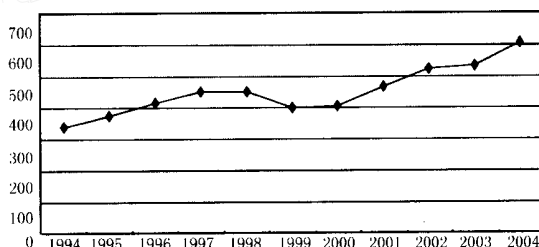
## 一、引言

近十几年来我国步入外资大规模增长阶段,流入外资数额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列,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呈逐步增加趋势(1999年和2000年有所下降,见图1)。截至2005年2月,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1万余家,合同外资金额11166.6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5700.69亿美元。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经济发展产生着深层次的影响。

同期,国内居民工资收入也呈持续增长趋势。其中,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平均工资普遍高于我国的国有企业,也明显高于全国总体平均水平(见图2),这与很多国家的情况大致雷同。外资大量涌入,必然会提高外资部门的平均工资。在外资部门工资大幅增长的同时,国有部门以及全国总体工资水平也出现了显著的提高。那么,国内工资水平的显著提高是否与外国直接投资的“工资溢出”效应有关以及“工资溢出”效应是否显著?这成为国内经济学界需要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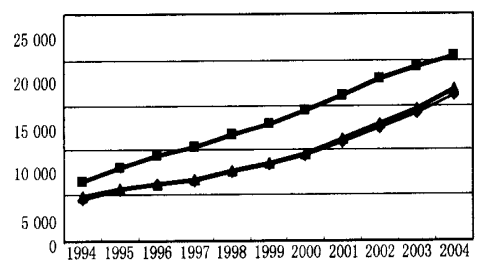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工资溢出”效应问题,国内外学者亦有相关的研究。Aitken、Harrison和Lipsey(1996)对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具体测算了一个行业或地区内外资企业的就业比重对国内企业工资的影响。在墨西哥,尽管系数不显著,但结果显示的趋势为,外资企业所占比例高,国内企业工资水平低。在委内瑞拉,外资企业的存在对国内企业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这个结果反映了劳动力流向外

资企业的再分配,即外资企业猎取了当地的优秀人才或购并了当地支付高工资的企业。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图1 1994 - 2004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图2 1994 - 2004年我国平均工资变化趋势(元)

Zadia和Lipsey(1999)对美国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研究则表明:1987 - 1992年间,外资份额的改变对制造业平均工资的影响不明显,而在其他行业,外资份额增加与平均工资有一定的相关性。Figli和Blonigen(2000)对美国两年的外资数据进行分析并发现,在制造业“工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在非制造业,对国内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较显著。在制造业的同一行业中,外资企业的进入与该行业中所有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增加密切相关,外资企业雇员增加所引致的工资增量比国内企业雇员增加所引

致的工资增量要高。

Bedi 和 Ciestik (2000) 对波兰制造业的研究也表明,在外资份额较高的行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工资增长率也较高,外资对工资水平有一定的正面影响。Gulia (2001) 对东欧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利用外资对波兰国内企业工资水平有正的影响,而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却表现为负的影响。这主要是由于在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和外资企业存在技术差距或者管理水平低下难以吸收新的技术(陈利敏、谢怀筑, 2004)。

Lipsev 和 Sjöholm (2001) 对印度尼西亚外资企业存在对国内企业的“工资溢出”效应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对各种不同行业和地区的外资比例进行了计算。在每一种情况下,外资企业对国内企业的溢出效应都是显著的,主要是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所致。

李雪辉和许罗丹(2002)在 Feenstra 和 Hanson 的外购理论基础上,利用中国外资集中地区的宏观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通过提高当地的熟练劳动的工资水平,外国直接投资可以提高我国外资集中地区的工资水平。杨泽文和杨全发(2004)利用我国 1985 - 2001 年的数据,从贸易与非贸易部门的角度研究发现,FDI 对东道国实际工资水平有正效应这一被普遍认同的结论只在 1997 年以后才适用。陈利敏和谢怀筑(2004)从外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角度实证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整体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

本文以 Ricardo - Viner (1977) 贸易模型为基础,参照 Chen (2002) 模型,并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影响,构建一个能够全面分析的理论模型,并采用 1994 - 2003 年间的省份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 FDI 对我国地区工资水平的影响。

## 二、传导机制与经验检验

### (一) 理论分析

在资本跨境流动的背景下,流入东道国的 FDI 凭借其具有的比较优势,通过三种效应来影响东道国劳动力工资水平。

第一,需求效应,即 FDI 的进入增加了对东道国的劳动需求,在劳动力供给和产品价格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引起劳动力价格提高。假定东道国劳动供给给定,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需求依据边际劳动生产率(从国内和外国的总生产函数得出)得到。如果外资企业有着生产优势,随着外资的增加,生产率提高,劳动力需求增加,如图 3 所示,劳动力需求曲线由  $d$  向上移动到  $d_1$ ,本地劳动供给曲线向

上倾斜,结果增加了均衡工资,产生了“工资溢出”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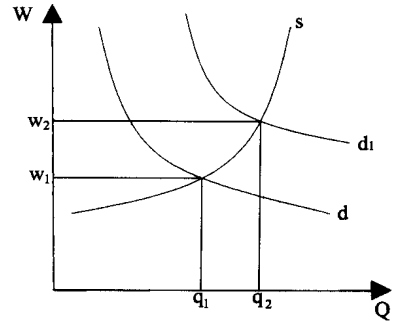


图 3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第二,资源禀赋效应,即 FDI 的进入增加了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提高了资本 - 劳动比率,使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报酬增加,引起劳动力价格提高。假定 FDI 只进入东道国 A 和 B 两部门中的 A 部门,东道国拥有三种要素  $(\bar{K}_A, \bar{K}_B, \bar{L})$ ,两部门 A 和 B 生产函数为  $F_A(\bar{K}_A, \bar{L}_A)$  和  $G_B(\bar{K}_B, \bar{L}_B)$ 。假定 FDI 只进入 A 部门,需要增加的劳动力由 B 部门的流出提供;由于东道国资本缺乏,所以假设资本的利率不变。FDI 进入东道国后,引起劳动力在部门 A 和 B 之间流动,劳动力流动结果:

$$L_A = \bar{L}_A + L_b$$

$$L_B = \bar{L}_B - L_b$$

其中  $L_A$  和  $L_B$  表示 FDI 进入后部门 A 和 B 的劳动力数量; $L_b$  表示从部门 B 转移出来的劳动力。FDI 进入东道国后,部门 A 和 B 资本拥有状况:

$$K_A = \bar{K}_A + k$$

$$K_B = \bar{K}_B$$

其中  $k$  表示 FDI 的数量,  $K_A$  和  $K_B$  表示 FDI 进入后部门 A 和 B 的资本数量。根据外商企业其资本密集度大于东道国资本密集度的假设,部门 A 在 FDI 进入后,资本增加量将大于劳动力增加量,资本密集度提高,  $W_A = P_A \times MP_{LA} > \bar{W}_A$ , 劳动力工资提高。FDI 使得部门 A 资本存量增加,提高了部门 A 的资本 - 劳动比率,在产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使该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出增加,所以 A 部门的劳动力价格提高。由于部门 B 劳动力流出,劳动力结合更多资本,资本 - 劳动比率也会提高,  $W_B = P_B \times MP_{LB} > \bar{W}_B$ , 劳动力工资上涨。现实中部门 A 和 B 的工资率上涨幅度取决于  $L_b$ , 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市场结构和市场分割等)。

第三,出口带动效应。依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外资流入部门 A 会使其他部门的要素向本部门汇集,增加本部门的产出和出口量,导致部门 A 的工资收入与部门 B 相比会上升,于是劳动力会向部门 A 转

移,直到部门 A 和 B 的工资收入相等为止。

## (二) 经验检验

下面,本文采用我国有关外资的历史数据,对上述效应分别给予直观的经验检验,为进行系统的实证分析奠定研究基础。

### 1. 需求效应

从 1990 年到 2004 年,我国每年实际利用外资从 34.87 亿美元增加到 606.3 亿美元,增长了近 17.4 倍;外商投资企业从业人员从 1990 年的 65.94 万人增加到 2004 年的 1 032.8 万人,增长了约 15.7 倍,对国内劳动力的需求效应日渐明显(见表 1)。

### 2. 资源禀赋效应

大量 FDI 流入以新设投资为主,跨国并购只占很小比例,能够大规模地增加国内的资本存量,产生显著的资源禀赋效应。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际间的跨国并购成为全球 FDI 流动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直接投资的最主要方式。全球跨国并购额从 1987 年的 1 000 亿美元,发展到 2000 年最高的 1.1 万亿美元,约占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额的 80%。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我国利用的 FDI 中,一直以新设投资为主,虽然最近几年,由于政策的放松和全球跨国并购的发展,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有所发展,但比例仍然很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统计,2000 - 2002 年跨国公司在我国的并购额分别为 22.5 亿美元、23.3 亿美元和 20.7 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实际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的 5.5%、5.0% 和 3.9%,比例仍然很小。

### 3. 出口带动效应

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都是进入一国市场的方式,跨国公司对一国的 FDI 增加,就有可能减少对该国的贸易。而在我国,FDI 和国际贸易呈现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系。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是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最主要因素,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国进出口额的比重,从 1986 年的 4.04%,增加到 2003 年的 55.48%,并且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另一方面,在华外商直接投资返销比例较高,近几年一直在 40% 左右(见表 1)。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中“加工贸易”、“补偿贸易”和“三来一补”的形式较多,这一比例更高。近年来,随着我国市场吸引力的增强,越来越多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返销比例有所下降,但是仍维持在较高的水平。造成这种较高返销比例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廉一直是吸引 FDI 流入的主要因素之一,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也主要是利用我国这一“世界

加工厂”的作用,而产品大多销往世界市场。

表 1 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状况

	实际吸收外商投资总额 (亿美元)	外商投资企业就业人数 (万人)	外商出口 (亿元)	返销比例 (%)
1990	34.87	65.94	373.71	83.24
1991	43.66	164.85	641.30	52.42
1992	110.08	221.27	957.33	46.35
1993	275.15	288.16	1 454.16	39.26
1994	337.67	399.67	2 991.81	34.59
1995	375.21	502.81	4 064.93	30.90
1996	417.26	540	5 113.73	33.92
1997	452.78	581	6 209.06	59.55
1998	454.63	577	6 702.92	47.33
1999	403.19	612	7 336.89	41.46
2000	407.17	642	9 887.80	42.72
2001	468.78	671	11 027.86	41.59
2002	527.43	758	14 065.69	41.65
2003	535.05	863	19 890.13	44.84
2004	606.30	1 032.8	28 025.8	47.63

说明:外资企业的返销比例是在华外商投资企业产值和出口额相除得到。

数据来源: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 三、理论模型的实证分析与回归结果的经济解释

在一个存在多部门的经济体中,依据要素禀赋和产出价格可以实现收入最大化(Dixit and Norman, 1980)。

$$r(p, v) = \max_x \{p \cdot x \mid (x, v) \text{ feasible}\} = p \cdot x(x, v)$$

其中,  $r(\cdot)$  表示收入函数,  $p$  和  $v$  分别是产出价格矩阵和要素禀赋矩阵,要素禀赋矩阵包括劳动力、内(外)资本和人力资本等要素。如果  $r(\cdot)$  是连续可分的,存在技术对单位产出规模报酬不变,通过在  $p_i$  对  $p$  微分  $r(\cdot)$  得到供给函数  $x_i$ 。

$$x(p, v) = r_p(p, v)$$

其中,  $x(p, v)$  对于  $v$  是一次齐次的,对于  $p$  是零次齐次的。同样,通过  $r(\cdot)$  对要素禀赋的微分可以得到要素价格函数。

$$w(p, v) = r_v(p, v)$$

其中,  $w(p, v)$  对于  $v$  和  $p$  都是零次齐次的。依据要素价格矩阵  $w_i$  和  $w_j$ , 相对于基础禀赋的要素禀赋  $(v_j/v_0)$ , 相对于基础禀赋的产出价格  $(p_j/p_0)$ , 可以求得一个总体的相对要素价格函数(O'Rourke, Taylor and Williamson, 1996)。

$$(w_i/w_j) = g_{ij}(v_j/v_0, p_j/p_0)$$

其中,  $g_{ij}$  对于  $v_j$  和  $p_j$  都是零次齐次的。由于在 H-O 定理中相对要素价格与相对要素禀赋基本上是同义的,所以相对要素价格可以用相对要素禀赋来替代。依据贸易模型和相对要素价格函数结果估计 FDI 对工资的影响,并且考虑国内资本与外商资

本对工资影响的相互代替性。 $w_i$  表示工资率,  $w_j$  表示资本的最低租金费率(利率), 得到相对要素价格函数的自然对数估计式:

$$\ln W_{kt} = \alpha_0 + \alpha_1 \ln H_{kt} + \alpha_2 \ln C_{kt} + \alpha_3 \ln L_{kt} + \alpha_4 \ln LL_{kt} + \epsilon_{kt}$$

其中,  $k$  和  $t$  表示省份和时期;  $W_{kt}$  表示名义平均工资(元)与利率(%)的比值, 即工资利息率, 用来衡量劳动力工资变化;  $H_{kt}$  表示 FDI 存量(百万元)与土地(千公顷)的比值, 土地采用农作物播种面积来替代;  $C_{kt}$  表示国内实物资本存量(百万元)与土地的比值;  $L_{kt}$  表示人力资本存量(年)与土地的比值;  $LL_{kt}$  表示劳动力数量(万人)与土地的比值;  $\epsilon_{kt}$  表示随机误差项。

### (一) 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与实物资本存量

本文采用 Fan、Zhang 和 Robinson (2002) 的永续存盘法, 把逐年的 FDI 流量换算成 FDI 存量数据。对于省份  $k$ , 在  $t$  期 FDI 存量计算公式:

$$K_{kt} = I_{kt} + (1 - \delta) K_{k,t-1}$$

其中,  $I_{kt}$  是在  $t$  期 FDI 的流量,  $\delta$  是折旧率, 本文采用三大部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折旧率的平均值 6%。同样, 采用上述方法把逐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换算成实物资本存量, 减去 FDI 存量为国内实物资本存量。

### (二) 人力资本存量

Psacharopoulos 和 Ariagda (1986) 认为, 最恰当测量人力资本发展水平的指标是教育成就的存量指标, 它被定义为人均受教育年限(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以各级受教育水平为依据进行分组, 把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人放在同一组中, 以接受过各级教育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为权重系数, 计算加权平均受教育年限。本文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人力资本存量 HC。

$$HC = \sum_{i=0}^4 y_i p_i$$

其中,  $y_i$  表示各教育水平的年限, 本文定义文盲半文盲受 0 年教育, 小学为 6 年, 初中为 9 年, 高中为 12 年, 大专以上为 16 年。  $p_i$  表示权重系数, 为各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

### (三) 利率、工资、劳动力数量与土地要素

本文分别采用总体平均工资利率比、内资部门平均工资利率比(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以及外资部门平均工资利率比三个指标来表示被解释变量。利率变量采用中期贷款利率, 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应年份的《国际金融统计》; 工资数据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其他数据如不作特

殊说明均来自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使用 stata 计量软件, 采用理论模型的回归估计式, 对 27 个省份 1994 - 2003 年间的面板数据, 分别进行了 12 次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计, 通过 Hausman 检验结果来判别应采用的估计模型形式(回归结果详见表 2)。在计量分析中, 常用 Hausman 检验来判定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谁更有效(Hausman, 1978)。检验形式如下:

$$H = x^2 [K] = [b - \beta]^{-1} [b - \beta]$$

其中,  $b$  是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系数,  $\beta$  是随机效应模型的估计系数,  $\Sigma = \text{Var}[b] - \text{Var}[\beta]$ ,  $H$  服从一定自由度的卡方分布, 若  $|H|$  大于临界值, 则接受固定效应模型, 反之应接受随机效应模型。

在估计模型中, 土地要素为外生变量, 中期贷款利率由官方控制, FDI 存量、实物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这 4 个解释变量直接影响工资变化。根据表 2 可知, FDI 与总体职工、内资部门以及外资部门工资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DI 引致了内资部门工资水平的上涨, 进而提高了我国总体工资水平, “工资溢出”效应显著, 这与李雪辉和许罗丹(2002)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从全国总体工资水平的角度看, 自东部到西部, FDI 的影响程度逐步减弱(0.554、0.332 和 0.269)。从内资部门工资水平的角度看, 自东部到西部, FDI 的影响程度也是逐步减弱(0.367、0.331 和 0.272)。从外资部门工资水平的角度看, 自东部到西部, FDI 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逐步减弱(0.777、0.435 和 0.329)。可见, 自东部到西部, FDI 存量对于 3 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逐步减弱, 这是由于东部地区是外国直接投资聚集区, FDI 在各省份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 对于各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有重要影响, 而在中、西部地区这种影响较弱。对照上述结果也可知, FDI 能够显著地大幅提高外资部门的工资水平, 而对于内资部门的“工资溢出”效应相应较弱, 这与“工资溢出”效应是由外资部门引致产生的结论一致。

实物资本存量(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存量(教育)、劳动力数量也与 3 个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表 2 回归结果来看, 对全国总体(内资部门)工资水平影响因素大小顺序是: 劳动力(-1.262 和 -1.207)、人力资本(0.630 和 0.702)、实物资本(0.560 和 0.601)、FDI(0.371 和 0.357)。外国直接投资是推动全国(内资部门)劳动力工资提高的重要因素, 而不是最主要因素。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成为关键因素。在外资部门, 对工

资水平影响因素大小顺序是:劳动力(-1.151)、FDI(0.486)、实物资本(0.424)、人力资本(0.343)。外资规模成为推动外资部门工资提高的关键因素,而人

力资本的影响相应较弱,可见外资部门受整个国内的人力资本状况制约较小,跨国公司主要是依靠内部网络(或者母国)的人力资本储备来运营。

表 2

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总体平均工资利率比				内资部门平均工资利率比				外资部门平均工资利率比			
	全国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4)	全国 (5)	东部 (6)	中部 (7)	西部 (8)	全国 (9)	东部 (10)	中部 (11)	西部 (12)
C	4.405 (16.01)	3.710 (8.39)	3.352 (7.67)	2.847 (16.28)	4.601 (16.24)	3.755 (8.26)	3.467 (7.90)	2.824 (16.11)	3.928 (11.80)	3.532 (6.43)	3.026 (5.16)	3.541 (10.23)
1	0.371 (9.42)	0.554 (7.57)	0.332 (6.58)	0.269 (4.88)	0.357 (9.03)	0.367 (7.11)	0.331 (6.53)	0.272 (4.93)	0.486 (8.80)	0.777 (7.85)	0.435 (5.23)	0.329 (3.81)
2	0.560 (10.26)	0.487 (4.92)	0.359 (4.64)	0.578 (5.81)	0.601 (10.71)	0.575 (5.65)	0.374 (4.82)	0.587 (5.89)	0.424 (4.87)	0.176 (1.14)	0.175 (1.18)	0.504 (3.09)
3	0.63 (6.56)	0.425 (2.83)	0.275 (1.79)	0.253 (5.49)	0.702 (7.10)	0.475 (3.08)	0.309 (2.00)	0.258 (5.58)	0.343 (-11.96)	0.156 (0.88)	0.071 (0.34)	0.317 (3.75)
4	-1.262 (-17.88)	-0.986 (-9.25)	-1.343 (-17.79)	-1.823 (-14.16)	-1.207 (-16.24)	-0.925 (-8.43)	-1.601 (-17.41)	-1.846 (-14.31)	-1.151 (-11.96)	-0.741 (-5.21)	-1.613 (-12.62)	-1.560 (-7.51)
R <sup>2</sup>	0.953	0.950	0.974	0.968	0.952	0.952	0.975	0.968	0.918	0.921	0.953	0.902
H	354.1#	108.7#	102.6#	1.39	311.4#	102.8#	140.5#	2.22	93.1#	76.0#	59.6#	9.2

说明:括号上面的数字表示回归系数,括号内的数字表示 T 统计量值,如果 T 统计量值大于 1.96,说明在 5% 的水平上显著;# 表示通过了 5% 显著性水平的 Hausman 检验(|H| 大于 9.488)。

资料来源:根据 stata 计量软件的回归结果整理所得。

#### 四、结语

FDI 流入能够给东道国带来积极的“溢出效应”,而“工资溢出”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效应。科学看待 FDI 的“工资溢出”效应,探讨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也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目标的客观要求。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1)“工资溢出”效应取决于内外资部门间劳动力流动大小(L<sub>b</sub>),以及劳动力市场状况(市场结构和市场分割等)。引导内外资部门间劳动力流动,促进劳动力市场竞争,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有助于发挥 FDI 的“工资溢出”效应。(2)我国存在着显著的 FDI“工资溢出”效应。十几年来,我国工资水平提高与 FDI 的大量流入是密不可分的。长期以来奉行的积极外资政策对各地区的内外资部门工资状况产生了积极影响,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聚集的东部地区受益最大。(3)FDI 的“工资溢出”效应不是推动劳动力工资提高的最主要因素,政府在固定资产投资和发展国民教育方面的政策和努力对于居民工资水平提高的影响更大,特别是政府在发展教育方面所作的努力增加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但是,由此产生的利益在内外资部门的分布不平衡,内资部门受益较多,而外资部门受益较小。因此,中央及地方政府改善教育状况、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坚持奉行积极的外资政策都会大幅提升各地区的工资收入水平。

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和海南 12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内蒙古、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 9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宁夏、陕西、甘肃、四川、云南和贵州 6 个省份。

#### 参考文献:

1. 宣烨、赵曙光:《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效应分析——以江苏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载《南开经济研究》,2005(1)。
2. 杨泽文、杨全发:《FDI 对中国实际工资水平的影响》,载《世界经济》,2004(12)。
3. Aitken, Brian; Harrison, Ann and Lipsey, Robert, 1996. "Wage and Foreign Ownership: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exico, Venezuel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6, Vol. 40, pp. 345 - 371.
4. Blomstrom, Magnus and Sjöholm, Frederic, 1999.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pillovers: Does Local Participation with Multinationals Matter?"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3, pp. 915 - 923.
5. Chen Weiyang, 2002.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ge Inequality across and within N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pp. 65 - 70.
6. Feenstra, Robert and Hanson, Gordon, 1997.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lative Wages: Evidence from Mexico's Maquiladora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Vol. 42, No. 3/4, pp. 371 - 393.
7. Gordon, R. H. and LL D. D., 1999. "The Effects of Wage Distortions on the Transi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pp. 163 - 183.
8. Lipsey, R. E. and Sjöholm, F., 200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Wages in Indonesian Manufacturing." NBER Working Paper, No. 8 299.
9. Zhao, Y., 2001.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Relative Wages: The Case of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pp. 40 - 57.

#### 注释:

实证估计有四个回归样本: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071)

(责任编辑:Q)